

焦点透视

编者按

近日,第三届全球女性发展论坛在浙江省建德市举行。论坛达成了以“半边天”力量投身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彰显女性新作为的“千鹤共识”。论坛包括圆桌对谈、主题演讲和三个平行论坛。平行论坛围绕“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妇女参与”“数字社会与妇女发展”“女性创业与共享改革成果”等主题展开,与会学者对上述主题进行了系统研讨。

彰显女性新作为 以“半边天”力量助力共同富裕

——聚焦第三届全球女性发展论坛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陈姝

近日,以“传承·弘扬·创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解放与妇女发展——发挥‘半边天’作用,实现共同富裕”为主题的第三届全球女性发展论坛在浙江省建德市举行。

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妇女署、埃塞俄比亚、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国的专家学者与中国专家学者一道,以“妇女能顶半边天”思想的重要发源地建德千鹤村为落脚点,达成了以“半边天”力量投身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彰显女性新作为的“千鹤共识”:传承并发扬千鹤妇女精神,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以行动建功新时代,以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以自身发展的“一小步”,推动全球妇女运动发展的“一大步”;坚定不移加强全球合作,为国际妇女事业发展贡献中国经验、中国方案。

此次论坛包括圆桌对谈、主题演讲和三个平行论坛。平行论坛围绕“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妇女参与”“数字社会与妇女发展”“女性创业与共享改革成果”等主题展开,与会学者从丰富的学科或工作实践视角,对上述主题进行了系统研讨和交流。

共同富裕与女性发展

圆桌对谈环节以“发挥‘半边天’作用,实现共同富裕”为题,浙江省妇联兼职副主席、万事利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屠红燕,中共建德市委书记朱欢,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原副主任、一级巡视员张立,中华女子学院党委书记李明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吴小英五位嘉宾,分别围绕“创新”“传承”“平等”“发展”“自强”五个关键词,谈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男女平等实践,传承和弘扬千鹤妇女精神的意义,新时代女性创新创业的状况,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推进妇女全面发展的路径以及对新时代女性自强与自主的理解。

主题发言环节中,南京师范大学金一虹教授、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曹立教授、中

共浙江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李涛教授、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主任魏开琼教授四位学者,分别围绕20世纪的“铁姑娘运动”的时代背景、发展历程及评价,中国共产党海外形象女性传播路径及其新时代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意义,共同富裕在促进农村妇女发展、提高妇女精神生活、提高妇女发展能力等方面的着力点,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进程中纳入性别视角的重要性等主题,进行了交流分享。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妇女参与

妇女组织在妇女参与社会治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与会学者从理论和治理实践出发,探讨了基层社会治理中妇联组织和妇女参与的相关问题。

妇联既不应被视为国家—社会—市场三分法中的任何一种纯粹组织类型,也不应被看作是一类混合型组织。中华女子学院副教授陈伟杰认为,在当代中国情境下,妇联身处党与群众之间行使其职能时,是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体系之一员而存在的。

厦门大学博士生杜祥提出,在践行马克思主义妇女思想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妇联组织充分把妇女吸纳到基层社会治理群体中来,既能够弥合性别平等的真空地带,又能够填补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动力不足。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静分享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妇女参与权实践,阐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妇女参与权的新发展,并依托《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展望了妇女参与国家治理的新机会与路径。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研究员石鑫探究了妇联组织在农村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独特作用,包括顶层设计推动妇女参与基层自治,拓展阵地开展普法维权和矛盾调解,以及创新机制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等。

中共中央党校副教授王晓莉分析了妇女组

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环境与组织环境,探究如何应对新时代妇女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挑战,比如逐步抬头的女性高地位迷思、消费主义盛行、互联网“数字鸿沟”等。

卢旺达性别与家庭促进部总干事 Mireille Batamuliza 分享了卢旺达女性社会组织——Headly Empowering Rights of Sisters 的活动及其对妇女和社区带来的变化。毛里求斯罗德里格斯区域议会管理支持官员 Anne Louise 介绍了当地妇女社会组织在促进两性平等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和获得的成果。

数字化对女性发展的影响

数字建设对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作用。与会学者针对妇联系统数字化改革,以及数字化对女性发展的影响展开了讨论。

杭州市妇联副主席、党组成员丁立燕分享了杭州市妇联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在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过程中找准推动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富裕的着力点和突破口的实践,并提出了打破城乡、地区、群体壁垒,强化数字赋能、业务协同、流程再造等数字化转型路径。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宋月萍教授发现数字经济赋予女性以职场新机遇的同时,也给女性就业造成困境。她提出了关注数字经济催生的新业态、新职业的女性需求,促进女性STEM教育,监管平台算法,促进家务劳动社会化等政策建议。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林晓珊教授指出,数字化时代的消费革命对提升女性消费能力、缩减消费领域的性别不平等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但是传统性别意识形态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交织,可能进一步加剧性别不平等。

当前,中国女性已成为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主体。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讲师夏真真认为,及时解决算法模型中相关性性别歧视对促进

数字金融市场的稳健发展尤为重要。

数字经济时代女性创业呈现出共享性、虚拟性和国际性等特征。针对数字经济时代女性创业的机遇和困境,中华女子学院网络与新媒体专业教师刘盼认为利用新媒体平台为女性赋权赋能,缩小数字性别鸿沟,促进社会多元助力等是推动数字经济时代女性创业的关键路径。

委内瑞拉妇女和性别平等权利部性别暴力监察办公室主任 Sahili Franco Cipriani 强调数字经济时代女性应获得投资、在线教育、就业、社会参与等方面的机会。

女性创业与共享改革成果

在经济社会转型和“双创”发展中,女性创业获得了快速发展,并呈现出新的特点。由此,“女性创业与共享改革成果”成为本次论坛的另一个焦点。

中华女子学院高秀娟副教授对2009年至2019年间我国女性创业政策进行多维测量,发现其特点表现为:数量呈“M型”特征,结构呈现中央强协调和地方弱协调性特征,政策主题分布呈现全面多元性与区域差异性特征,政策工具分布呈现发展性而非均衡性特征。

学者们对宝妈、农村走向城市女性、农村妇女等不同群体的女性创业者进行了关注。杭州师范大学讲师李之易以宝妈电商主播为研究对象,提出“宝妈表演劳动”概念。上海大学何冰冰考察了十位从村镇走向大城市的女性创业者的生活方式与行动策略,分析其创业行为和人生塑造的身份认同问题。中华女子学院讲师杜声红分享了建德市三江口渔村在当地妇联组织的精心打造下,渔嫂互助组织的形成及经验。

对于如何进一步促进女性参与社会组织创办与发展,上海大学博士生周海燕建议,一是完善家庭福利;二是加强专业性培训,提升女性社会组织管理能力;三是建立女性公益创业者协会,推动多区域、多领域合作交流。

《法律如何定义对妇女的歧视》

作者:戴瑞君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已列入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计划。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了男女平等、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的基本原则,但没有界定什么是“歧视”。中国批准的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1条就对“对妇女的歧视”作出定义,明确了构成对妇女歧视的事由、行为、不利后果、因果关系、适用领域等关键要素,表明对妇女的歧视包括直接歧视、间接歧视、制度性歧视,揭示了歧视妇女的主要根源来自私领域的歧视和结构性歧视。中国现行法律没有对“歧视妇女”下定义,致使实践中难以识别歧视、预防歧视和救济歧视。为实现男女事实上的平等,促进妇女全面发展,中国法律需要按照国际人权公约的义务要求,借鉴比较法学的经验,基于中国实际,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对歧视妇女作出全面定义。

来源:《妇女研究论丛》2021年第5期

《男耕女织:互联网平台劳动中的职业性别隔离研究》

作者:梁萌

本文聚焦于互联网平台劳动中的职业性别隔离现象,从交叉性视角出发,以外卖业和家政业的工作环境和劳动过程为主要比较分析线索,提出平台企业主要通过固化已有性别分工、建构性别化的职业气质和惩罚越轨者三个方面最终建构出“男耕女织”的高度职业性别隔离的劳动力群体。因此,该产业中的性别隔离并非仅是传统性别分工的自然延续,也是平台企业为吸纳新生代劳动者群体而刻意为之。这不仅使具有“自由”“竞争”等代际特性的新生代农民工最终被整合到产业发展中,也给流动群体整体的性别平等趋势带来新的挑战。

来源:《中国青年研究》2021年第9期

《工作抑或家庭:多重角色视角下性别红利释放的理论探讨》

作者:朱芸 陆杰华

在人口结构转变和社会经济转型宏观背景下,性别红利既是女性赋权和女性潜能发挥而产生的一种新型人口红利,同时也被看作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本文尝试从当下工作家庭复合场域中多重角色叠加的视角,全方位地审视和理解性别红利所固有的理论内涵及其特殊的表现形式。研究发现,无论从理论还是现实来看,性别红利的多重角色主要来源于宏观社会期望、中观两性关系和微观自我认知三个维度,其中社会角色期望的刻板固化、两性角色博弈的事实冲突和自我角色协调的转换失灵,是影响当下性别红利释放的三大机制。为此,释放性别红利不仅在于从家庭关系和两性关系的微观层面上剖析影响性别红利释放的主要因素,更要通过宏观层面适宜的公共政策和制度安排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多重角色,进而充分获得性别红利带来的社会经济效应。

来源:《中山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

(范语晨 整理)

观点秀场

《我和我的父辈·诗》:诠释“父辈”新意涵,再现女性引路人

阅读提示

近日热映的主旋律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由四个故事组成,主要聚焦于不同历史时期两代人的共同生活。与其他三个故事中呈现的传统妻母形象相比,《诗》以女性主义视角,通过对“长征一号”火箭的燃料雕刻师郁凯迎的生动塑造,重新诠释了“父辈”的概念,挖掘了女性常被忽略的开拓者、引路人角色,勾勒了作为“父辈”的女性的动人形象。

李雨轩

近日热映的主旋律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由四个故事组成,主要聚焦于不同历史时期两代人的共同生活。四个故事中都有女性的出场,但《诗》中的女性形象与其他三者有较大不同。《乘风》中,乘风的母亲借由话语而存在,表现了对革命的疏离;《鸭先知》中,赵平洋的妻子一开始表现出对丈夫事业的质疑;《少年行》中,小小的母亲也表现出对小小“科技癖”的压制。这三个故事中的女性表现为传统的妻母形象:疼爱孩子的生命,庇护孩子的成长,却更渴望普通、规矩的生活。但《诗》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它以一种女性主义的视角,通过对“长征一号”火箭的燃料雕刻师郁凯迎的生动塑造,重新诠释了“父辈”的概念,挖掘了女性常被忽略的开拓者、引路人角色,勾勒了作为“父辈”的女性的动人形象。

从“父父之名”到母亲发声:“诗”中暗含的父权消解

影片中的夫妻俩——施儒宏、郁凯迎,都是“长征一号”火箭研制的攻坚者,他们为了国家的事业而扎根内蒙古,并在此生育儿女。在工作上,施儒宏负责的是燃料和发动机的配合,郁凯迎则是燃料雕刻师,两人的工作都是工业的、危险的,加之郁凯迎的徒弟也是男性,因此工作中体现不出明显的性别分化。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男性和女性形象的相似性,但这种相似性主要体现在工作上,在家庭空间中两人的性别差异依然可见:父亲更为活泼,母亲更为隐忍;此外,母亲还要负责做饭等家务。

施儒宏的不幸罹难,迫使郁凯迎不得不承担孩子父亲的职能。她对父亲的死必须保持缄默,又得营造父亲“在场”的假象。她不断写诗,代替

父亲表达对孩子的关切和教育。然而,大雨那夜,“父亲”的缺席再难以遮掩,儿子的怀疑和逼问让她深感无力,郁凯迎作为女性的困境由此凸显:一方面,大雨加剧了孩子的恐惧和对父亲的呼唤,儿子的话语强调了母亲和父亲的差异及父亲的不可替代性,她必须安抚孩子的情绪,直面孩子的质疑;另一方面,她是孤独的,丈夫的缺席使她缺少陪伴,她要一个人应付这场大雨。但正是这场大雨,作为一个转折、一个契机,使郁凯迎决心敞开心扉,对儿子讲明实情。

如何让一个孩子理解死亡?这里涉及一个深刻的死亡启蒙、死亡教育问题。当郁凯迎镇定地对儿子说,“我也会死”,她完成了对孩子的死亡教育的第一步,也即借由在场的鲜活生命,让孩子了解、直面人的有死性。之所以借助自己而非父亲,是因为父亲的死非但无法令孩子理解,还可能造成其内心的创伤。但这仅是第一步,更为关键的则是通过片尾的那首长诗:燃料是点燃自己、照亮别人的东西/火箭是为了梦想,抛弃自己的东西/生命是,用来燃烧的东西/死亡是,见证生命的东西/宇宙是,让死亡变得渺小的东西……

这首诗概括了影片的主题,揭示了死亡与生命的辩证法,升华了死亡的意义,也从根本上消除了孩子对死亡的恐惧。至此,死亡教育真正完成了。而值得注意的是,就人论来看,这首诗通篇只出现了一个“我”,而没有“我们”,在影片中这首诗也是由郁凯迎诵读的。这意味着写给孩子的诗不再像以往那样冠以父之名,而完全是以母亲的名义写作和传达的。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在拉康后期的“三界理论”中,死亡问题属于象征界,而象征界本是由父性主导的。就现实层面看,在传统的父权社会,只有父亲才有资格对后辈进行严肃的智识教育和思想引领,而母亲则



只能承担生养、家务等方面的次级任务。但在这里,对孩子进行死亡教育、成长教育,并使其进入象征界,恰恰是由母亲来完成的。这既是对家庭领域内传统性别分工的解构,也意味着对父权的消解。因此,郁凯迎实则是用母亲的身份传达了普遍的真理,是母性和父性的综合体;而“诗”也表征着对这种力量和价值层面的肯定。

“父辈”意涵的再审视:重新看见女性开拓者和引路人

在跳出“父亲”之名,直接以母亲的身份向孩子进行死亡教育之外,郁凯迎职业角色的塑造也同样跳出了女性作为家庭支持性而非事业开拓性角色的刻板定位。她主动请缨,对精度进行攻坚。在经历丧夫的剧痛后,她仍兢兢业业地全力工作,充分体现出女性并不囿于传统的性别分工,而是积极追求公共领域的价值实现。

《诗》的女性主义特质不仅凝聚在郁凯迎身上,还散射到子辈身上。《乘风》《鸭先知》《少年行》的子辈清一色都是男性,只有《诗》的子辈同时存在男性和女性,并且在两人长大之后,哥哥反而受到抑制性塑造,是妹妹成了光荣的宇航员,换言之这种传承也是通过女性来实现的。当年那个瘦小、天真的小女孩,终于坚定地继承了父

辈的意志,见证了父辈梦想的实现。

相较于其他三个故事中男性的“过剩”和女性的“保守”,《诗》具有较强的异质性。这受惠于女性导演章子怡,章子怡在接受采访时说:“父辈不仅有父亲,也包括母亲和我们的师长,以及给予过我们帮助的前辈。”这是对“父辈”概念的全面阐释,消解了其中男性权力的唯一性,也消解了其中强烈的性别指涉色彩,“父辈”被阐释为一个时间性概念,指向引路人、庇护者的角色,他们/她们开拓事业,引领风尚,又教育后辈,提携后辈。以此观之,《诗》的亮点和价值不在于刻意塑造男性和女性的对立,而在于使这种表层的对立无效化,在于构建女性与“普遍”的联系。

我们欣喜地发现,郁凯迎这样的女性形象不仅存在于荧幕上,不仅存在于历史中,也鲜活于当下的现实里。获得“七一勋章”的张桂梅,不正是作为开拓者和引路人的女性代表吗?她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永远令我们钦佩和振奋,给我们鼓舞和力量。而当下的文艺创作也应紧扣现实,努力发掘、塑造、彰显这样的女性形象,不再仅将女性表达囿于家庭空间,而是更加注重展现其在公共领域所做出的事业和贡献。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